

「手足親情」對杜牧政治生涯的影響

朱錦雄*

【摘要】

杜牧風流事蹟流傳甚廣，故常有「風流才子」的形象。的確，揚州幕下的生活，可說是杜牧一生當中最順遂張揚的時期；但自離開揚州幕後，杜牧的仕途起伏，其實深受手足親情的羈絆，對杜牧仕途選擇之影響更加深遠。

學者常從「牛李黨爭」的角度來評斷杜牧政治生涯的起伏，然而透過杜牧詩文細究其仕宦生涯，卻可以發現「手足親情」其實在杜牧人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對於其弟杜顥的情感，每每影響杜牧在仕途轉折點上的選擇。

杜牧官職的轉換，在許多討論其生平的論述中，已是定論，但因為手足親情而有官職轉化的過程，對杜牧的心理狀態有什麼影響？論者卻鮮少觸及，本文即以此角度，嘗試爬梳杜牧在做出這些決定時，心態上的轉折變化。

關鍵詞：杜牧、手足親情、杜顥

*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賴瑞和（1953-2022）曾以眾多唐代文人仕宦生涯為例證，論述中晚唐時期各類官職在文人心中的地位，並提出一條當時文人初入仕途的理想任官途徑：

中晚唐的基層文官當中，最成功、入仕條件最好的，是一個進士出身，又考中制科或博學宏辭者。他往往先在京城任校書郎，然後通過他父執輩的世交關係，被某個相熟的節度使或觀察使，辟為掌書記（最佳）、或推官或巡官（其次）。¹

按照「理想」，他會以京城中的校書郎或正字起家，然後出為畿縣的縣尉，再回到京城朝中任監察御史、郎官、再步上中書舍人、侍郎等高官的行列。²

以此為對照，則杜牧（803-852）仕宦初期，可說是完全按照上述理想任官途徑進行。杜牧從大和二年（828）進士及第、制舉登科開始，先是釋褐為校書郎，約六、七個月後就相繼入江西觀察使（後調任宣歙觀察使）沈傳師及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幕下，從巡官、推官到掌書記，大和九年（835）回京任職監察御史，不難看出此時其仕途之順遂。然而，依照目前所知的杜牧生平記載，杜牧的仕宦大多非京官，外放的時間至少超過整體仕宦生涯的三分之二，以唐人普遍重京官輕外官的觀念來看，仕途似乎又不能說是順遂了。

依目前所知史料而言，杜牧的仕宦生涯共有四次出任外官，可整理為下表：

¹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313。

²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8），頁37。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至大和九年（835）	入沈傳師及牛僧孺幕下
唐文宗開成二年（837）至開成三年（838）	入崔鄆幕下
唐武宗會昌二年（843）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任黃州、池州、睦州刺史
大中四年（850）至大中五年（851）	任湖州刺史。

又據杜牧〈自撰墓誌銘〉記載：

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以弟病，乞守湖州。³

則開成二年（837）入宣歙觀察使崔鄆（780-850）之幕，以及大中四年（850）任湖州刺史，皆是因杜牧之弟杜顥（807-851）生病而主動選擇外放，可見在杜牧仕宦生涯的抉擇中，兄弟之情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杜顥小杜牧四歲，大和六年（832）進士及第，正式進入仕途。⁴原本為試秘書正字、匭使判官，大和八年（834）11月，李德裕（787-849）出為鎮海節度使時，辟杜顥為試協律郎、巡官。為此，杜牧還寫了〈送杜顥赴潤州幕〉贈送給杜顥：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
直道事人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
還須整理韋弦佩，莫獨矜誇玳瑁簪。
若去上元懷古處，謝安墳下與沉吟。⁵

頡聯先用《論語·微子》柳下惠所言「直道而事人」⁶以期許杜顥在政治上應有的態度；接著再用〈行行重行行〉「努力加餐飯」之典，提醒杜顥保重身體，展現兄弟之間深切的情感。頡聯則用《韓非子·觀行》：「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⁷之典，

³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812。

⁴ 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同前註，頁 751。

⁵ 同前註，頁 1278。

⁶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頁 256。

⁷ 東周·韓非，〈韓非子〉，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黃蕘園校宋鈔本，1965），頁 41。

以及「玳瑁簪」之物，來提醒杜顥需留心的處事態度。詩的最後再勉勵杜顥能向謝安看齊，有其理想與成就。詩中充滿了兄弟情誼，可見兩人情感之深。

杜牧官職的轉換，在許多討論其生平的論述中，已是定論，但因為手足親情而有官職轉化的過程，對杜牧的心理狀態有什麼影響？論者卻鮮少觸及，本文即以此角度，嘗試爬梳杜牧在做出這些決定時，心態上的轉折變化。

二、「因請假造成自動解除監察御史」時的心態

杜牧在大和九年（835）回京任職監察御史後，沒多久就隨好友李甘被貶而「移疾分司東都」，關於此事之緣由，有不同說法：顏崑陽（1948-）認為是因為杜牧不願在朝中與小人為伍；⁸繆鉞（1904-1995）有兩種說法：《杜牧傳》認為是「感覺危懼」；《杜牧年譜》則認為是「侍御史李甘因反對鄭注、李訓，被貶為封州司馬，杜牧即移疾，分司東都」；⁹朱錦雄認為「或許杜牧正是因為『通古今，善處成敗』……一方面知道向上勸誡已是無益，另一方面恐怕也為趨吉避凶，故寧願自請外調東都，遠離權力核心，也不願意獨自待在長安面對小人專權的局面。」¹⁰雖然一般認為分司東都官職清閒、不受重視，但勾利軍卻認為：「東都留台御史遠離京師，職任又十分重要，任職者須得朝廷信任。……杜牧由監察御史里行拜東都監察御史，無疑是對他的重用。」¹¹可見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並不見得會對其仕途產生重大影響。即便同年十一月發生

⁸ 顏崑陽，《杜牧》（臺北：國家出版社，1990），頁131。

⁹ 繆鉞，《杜牧詩選（補改本）杜牧傳杜牧年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頁207、332。

¹⁰ 朱錦雄，〈從「大和二年制舉事件」和「甘露之變」二事解讀杜牧對宦官的看法〉，《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第十六卷第2期（2022.7），頁204。

¹¹ 勾利軍，《唐代東都分司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17。

了「甘露之變」，杜牧的政治心態或許也有所改變，¹²但杜牧仍舊沒有藉機離開中央朝廷。

開成二年（837），杜顥眼疾已近全盲，杜牧按照韋楚老（803-841）的建議，尋求眼醫石公集的協助，〈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云：

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¹³

依照唐制，請假若過百日，便會解除職務，而洛陽至揚州的路途遙遠，也難以預測治療所需時間，故杜牧預先排定百日假期，便代表已有心理準備可能會面臨解職處境。最後果然逾期未歸，故於同年秋末，請託進入宣歙觀察使崔郾幕中，任團練判官。可見杜牧在「甘露之變」後，或許對於政治感到有些失落與憂懼，但真正促使杜牧離開洛陽監察御史之職的原因，還是因為杜顥之眼疾。

這個選擇對杜牧來說各有利弊，好處是不僅可以繼續陪伴杜顥就醫，而且幕職的薪俸往往比京官高，可以紓解因負擔弟弟的醫藥費和兩家的生活費，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而且崔郾之兄崔郾（768-836）是杜牧進士試的座主，依藉此關係，¹⁴崔郾應會善待杜牧，對杜牧未來的仕途或有助益；弊端則是從清要的監察御史變成幕下之職。唐人原本就有重京官輕外官的觀念，更何況監察御史雖品階較低（正八品上），但絕非不重要的官職，賴瑞和指出：

¹² 胡可先：「甘露之變可以說是杜牧心態的轉折點。杜牧在早年絕不是全身遠禍之人，……這一事變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跡。……他的經世報國的希望幻滅了，情緒逐漸轉為消極。」見氏著，《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153、154。

¹³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1009。

¹⁴ 傅璇琮以為：「唐代的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發展成一種新的官僚勢力互相依存與接合的關係。」見氏著，《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53。李昱東以為：「凡掌貢舉之主司，皆稱為座主。座主與門生，本來只是一種禮儀上的名份關係，後來卻形成了報恩的具體內容，他們感謝的是座主的賞賜和提拔，使他們進入清官的行列，可以迅速高升，作為參加科考的歸宿。這主要的是主司有很大的決定權，才成為門生頌揚的對象，並形成特定的關係。」見氏著，〈唐代科舉制度的演進〉，《空大人文學報》第19期（2010.12），頁201。

能夠當上監察御史，都是一些考中進士、明經，或者出身非常良好，仕宦條件非常優秀的士人。他們通常得在京城任過校書郎這種「美職」，或在外地當過一兩任地方官，才能回到朝中任監察御史。這是一種很清要的官，也是皇帝的「耳目」，絕對不能以低層或基層小官視之。

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都是一種清官。他們不是由吏部詮選，而通常是由長官推薦，或御史臺長官自辟，再由皇帝敕授。¹⁵

杜牧費了7年的時間，終於從幕職進入中央朝廷，擔任清要的監察御史，正準備邁向光明的仕途，才經過2年，卻又不得不選擇放棄，這對杜牧來說，心裡必定五味雜陳、難以言喻。雖然重回幕職擔任團練判官，在官職的品階上並沒有降低，也不能完全說是仕途坎坷，因為據賴瑞和的研究：

判官屬於中層文官，一般人都要先任其他官，且有多年官場經驗才能攀升到此。¹⁶

尤其在擔任過判官後，便可以晉升到更高的官位（如：刺史、節度使），可以說是升至高官的重要樞紐之一，¹⁷而且因為判官沒有品秩，所以都會帶有朝銜或憲銜，杜牧也因此有了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的憲銜，¹⁸以品階來說，亦是升級¹⁹，只是此次離開中央朝廷、解除清要之職，畢竟是在仕途上失去一次珍貴的機會，再加上弟弟病情嚴重的兩面夾擊下，所以杜牧心情實為低落，也出現許多低沉情緒之作，如〈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¹⁵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頁48、73。

¹⁶ 同前註，頁452-453。

¹⁷ 同前註，頁450-451。

¹⁸ 賴瑞和以為：「把『內供奉』視為是某某官的一種『亞類』，……『亞類』表示略低一等，地位不如它的『主類』，……我們可以把內供奉和裏行視為一種員外置官，一種『亞類』。」同前註，頁97-98。

¹⁹ 唐代監察御史為正八品上，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上，侍御史從六品上。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
獨鶴初沖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
行開教化期君是，臥病神祇禱我知。
十載丈夫堪恥處，朱雲猶掉直言旗。²⁰

詩中先提及韋楚老將返回朝廷繼續擔任清貴的諫官「拾遺」，故杜牧以「鶴沖太虛」為喻祝賀，並以「行開教化」的國家大事期許；再以「九牛一毛」來形容自己捨棄同樣清貴的監察御史一職，對國家毫無影響，同時表示目前只希望神祇能保佑杜顗的病好轉。看似輕描淡寫地帶過「洛中監察病假滿」的情形，實則在一進一退的比喻中，隱藏著失落的情緒，尤其最後提及漢代朱雲不懼死亡，直諫漢成帝之事，²¹用以自比，正顯示了杜牧對於離開監察御史一職的憾恨。

這種失落的情緒在此次的宣州幕下時，時有顯露，如〈大雨行〉（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
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
盡召邑中豪健者，闔展朱盤開酒場。
奔觥槌鼓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腰娘。

²⁰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329-330。

²¹ 漢·班固：「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見氏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六十七，頁 742。

今年鬪茸鬢已白，奇遊壯觀唯深藏。

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²²

杜牧在大和四年（830）九月，因沈傳師（777-835）遷為宣歙觀察使，而一同到了宣州，一直待到大和七年春天才離開，那是杜牧首次擔任宣州幕職，故詩中先描述了當時「壯氣神洋洋」的神情姿態，並提及許多過往的豪氣狂放事蹟；接著筆鋒一轉，寫出現在再至宣州時的蒼老，藉由當時的氣盛突顯今日的衰颯，呈現今非昔比之感。然而，此不過是詩的表面義，因為大和六年（832）杜牧三十歲，開成三年（838）杜牧也不過三十六歲，即便身體有逐漸衰老之嫌，卻也不致相差過大，故杜牧所言之衰颯，應為精神層面。對杜牧來說，原以為可以脫離幕職，開啟錦繡前程，想不到繞了一圈，竟又來到相同的地方擔任幕職，彷彿一切回到了原點，這正是「堪悲傷」之處。而且杜牧刻意選擇大和六年作對比，恐與杜顥也是在這一年進士及第有關，當時兩人都已踏入仕途，準備一展長才，怎料六年後竟是如此遭遇，豈不令人唏噓。

這種低落的情緒，也影響了杜牧對於未來仕宦生涯的悲觀，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²³

范蠡（前536-前448）是士大夫功成身退的典範人物，杜牧或許是自覺在政治上功成已無望，故「無因」可追尋范蠡，而興起了惆悵之感。即使在開成三年（838）冬，得到重回朝廷任左補闕（從七品上）兼史館修撰的任命，但這種對政治上功成名就不抱期待的想法，依舊存在。如開成四年（839）春，於入京途中所寫的〈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鈐利筋骨輕。……

重遊鬢白事皆改，唯見東流春水平。……

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²⁴

²²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148。

²³ 同前註，頁352。

以及〈自宣城赴官上京〉：

瀟灑江湖十過秋，酒杯無日不遲留。

謝公城畔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

千里雲山何處好，幾人襟韻一生休。

塵冠挂却知閑事，終把蹉跎訪舊遊。²⁵

兩首仍舊呈現與〈大雨行〉（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一樣的低沉基調，甚至出現「終老煙波」、「塵冠挂却」等與退隱相關的念頭，完全不見重新歸京、期待仕途重新開展的興奮情緒。

開成五年（840）杜牧遷為從六品上的繕部員外郎兼史館修撰，職位逐步高升，但託付給堂兄杜慥照顧的杜顥，病情依舊沒有起色。那年冬天，杜牧又請假去探望杜顥，〈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曾說過此事：

（開成）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顥西歸，顥固曰：「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顥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²⁶

這段陳述並沒有記載，當杜顥不願跟隨杜牧返回長安時，杜牧是先行返回長安銷假，然後隔年（會昌元年，841）四月再至江州陪杜顥隨杜慥至蘄州，七月返回長安，或者是在開成五年（840）冬天開始，就一直陪著杜顥，直至會昌元年（841）七月才離開。如果是前者，則杜牧在7到9個月的時間內，來回奔波兩次，如果是後者，則杜牧應該又面臨了因請假過百日而解職的處境。但無論是哪種選擇，都可以看出杜牧無論身在何處任職，始終無法放下病重的弟弟；仕途之路，也常為了杜顥而有所變化。

²⁴ 同前註，頁 151。

²⁵ 同前註，頁 361。

²⁶ 同前註，頁 1009。

三、「重返朝廷後卻又極力爭取刺史」的心態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中，有一段話值得注意：

堂兄慆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²⁷可見杜牧在開成三年（838）任左補闕兼史館修撰時，便已體認只有刺史等級²⁸的薪俸，才足以完全滿足杜顥醫療所需，所以當會昌二年（842）杜牧外放為黃州刺史後，憑藉著刺史較為優渥的俸祿，²⁹不但可以再請名醫周師達到蘄州醫治杜顥，也可以照顧其他親人的生活。〈上宰相求杭州啟〉就說的很清楚：

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³⁰

²⁷ 同前註。

²⁸ 學界在討論唐代州府時，多將其分成「府」、「輔」、「雄」、「望」、「緊」、「上」、「中」、「下」八個等級，但賴瑞和認為應該將「八個等級」改稱為三種類別：「府級」、「地望」、「戶口」，並根據州府定位、官品、職望和俸錢等因素，將刺史粗略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是府級的尹、重要都督府和都護府州的都督和都護；第二等是輔、雄、望、緊州和上州刺史；第三等是中下州刺史。若依官品區分，則上州刺史為從三品、中州刺史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見氏著，《唐代高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346-352、357、363-365。

²⁹ 根據賴瑞和的討論與整理，杜牧任膳部、比部員外郎兼史職的官品是從六品上，俸錢是4萬文，任屬於下州的黃州刺史，官品為正四品下，俸錢則未見於史料，僅能知道會昌年間上州刺史的俸錢是8萬文。不過賴瑞和引用陳寅恪的論點，認為中晚唐地方官吏有許多雖不載於法令，但可以被視為正當來源的收入，且數量遠在中央官吏之上。見氏著，《唐代高層文官》，頁357、363，以及《唐代中層文官》，頁533；顏崑陽則引用《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五，〈唐紀四十一〉，〈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句下胡三省의注：「自是年定俸之後，至于會昌，則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刺史……七萬。」認為杜牧會昌年間擔任下州刺史俸錢應是「倍之」的14萬文。見氏著，《杜牧》，頁112。胡三省의原文參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72），卷二百二十五，頁7246。

³⁰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1018。

連續三任下州刺史（黃州、池州、睦州）的生活，雖然在政治上明顯不算順遂，但在經濟上無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只是當調任為睦州刺史後，杜牧顯然無法接受連續三任皆是下州刺史的安排，³¹不僅許多詩作都顯示出強烈的失落情緒，也開始四處請求朝中有力人士協助返回中央。³²終於在大中二年（848），經由周墀（793-851）的推薦，杜牧得以入京任職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杜牧對於此次遷官感到非常興奮，〈上周相公啟〉云：

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污泥，昇於霄漢，卻收斥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³³

略為誇張卻又生動的詞彙，使杜牧既驚訝又興奮的情緒，表露無遺。〈除官歸京睦州雨霽〉一詩，更是顯現了此次歸京的愉悅心情：

豈意籠飛鳥，還為錦帳郎。網今開傳變，書舊識黃香。³⁴

首二句分別用「籠飛鳥」³⁵和「錦帳郎」³⁶來表明自己地位和心情的變化。「籠飛鳥」表明受到束縛，而「錦帳郎」即指郎官，此處應是想表現出

³¹ 賴瑞和曾討論會昌年間睦州的等級，認為「在天寶年間，睦州為上州，應無疑問，但到了杜牧的會昌大中年間，是否仍為上州，頗成疑問。《元和郡縣圖志》也記睦州為『上』，開元戶數為 55516，元和戶數則劇跌至 9054。看來《元和志》給睦州的上州定位，是根據開元戶數而來。如果依元和戶數，睦州只能算是下州。……從這『才千餘家』（指杜牧〈祭相公文〉）的描寫，以及元和戶數 9054 看來，睦州在杜牧出刺的時代，應當已經不再是繁華的上州，而是破落的下州了。」見氏著，《唐代高層文官》，頁 358-359。

³² 參見朱錦雄，〈牛李黨爭與杜牧的政治立場〉，《東華漢學》第 39 期（2024.6），頁 132-134。

³³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981。

³⁴ 同前註，頁 403。

³⁵ 周·鵬冠子：「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見氏著，宋·陸佃解，《鵬冠子》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陰繆氏菰風堂藏明覆宋刊本，1965），卷十二，頁 36。

³⁶ 南朝宋·范曄注引蔡質《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見

一種榮耀感。從這兩句可以感受到杜牧認為連續三次的刺史生涯，就像是被困住的籠中飛鳥，任人擺佈，無法施展遨翔的能力，如今終於可以重回京城，擺脫束縛，因而喜悅之心情，躍然紙上。接下來兩句，分別用了傅燮（？-187）³⁷及黃香（68-122）³⁸的典故。傅燮及黃香皆曾為郎官，不僅與杜牧即將上任之官職相仿，漢靈帝猶識傅燮之言，而摒除譖言，正對應杜牧終於也為朝廷網開一面；而黃香曾「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對應了杜牧此次兼史館修撰，再度擔任史官，則史館所存之書，應當還認得自己，又漢章帝再詔黃香之時，且薦之諸王，也期望自己有此殊榮。提及這些歷史事蹟，應該可以視為杜牧對此次返京的興奮與期待。

自杜顗失明後，杜牧難得展現出對於赴官歸京的期待與欣喜。照理說，好不容易才順利脫離地方刺史之職返回中央朝廷，杜牧應該會希望在長安好好發展，但明明大中二年（848）十二月才抵達長安，他卻在大中三年潤十一月（849）至大中四年（850）的夏天，連續以極為謙卑之詞上書數次（〈上宰相求杭州啟〉、〈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啟〉），主動請求外調為刺史；也在〈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聖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詩兼自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一詩中提及：「若念西河舊交友，魚符應許出函關。」³⁹表明擔任刺史的意願。

氏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十一，頁375。

³⁷ 南朝宋・范曄：「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後拜議郎。」見氏著，《後漢書》，卷五十八，頁492。

³⁸ 南朝宋・范曄：「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見氏著，《後漢書》，卷八十，頁678。

³⁹ 吳在慶注：「此詩乃杜牧為求外任而上諸人。」見氏著，《杜牧集繫年校注》，頁312。

杜牧出乎意料的舉動，其實還是來自於手足親情的羈絆，在其上奏求刺史之文，皆清楚說明令杜牧低頭乞求的原因：

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弟顓，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為餬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朱馬，縵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上宰相求杭州啟〉）

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顓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

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為淮南客矣。……所可仰以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歎吒悲恨，不可得也。……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啟〉）⁴⁰

〈上宰相求杭州啟〉、〈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啟〉皆提及了乞求上州刺史之職，是為了供給「病弟孀妹」的生活所需，〈上宰相求杭州啟〉甚至還提到了「有餘兼及長兄」杜慥；而〈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上宰

⁴⁰ 以上參見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1018、1004、1008、1015。

相求湖州第二啟〉則著重描述杜顗之悲慘情形，以求獲准。若再參看杜牧過世前所寫的〈自撰墓誌銘〉：「以弟病，乞守湖州。」⁴¹應可理解杜牧之所以不斷乞求上州刺史的主要因素，其實是杜顗。

這個舉動的起因，正是由於杜顗的眼疾。會昌二年（842），兩兄弟曾商議：「揚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游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冀其所遇。」⁴²為了治癒眼疾，杜顗便於秋天，舉家遷至揚州，依附時為淮南節度使的堂兄杜悰（794-873）。到了大中二年（848），杜牧將從睦州刺史轉任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前，先至揚州探望杜顗，才發現杜悰於會昌四年（844）入朝拜相後，便沒有照顧杜顗。兄弟相見時，杜顗「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讓杜牧下定決心說出：「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⁴³杜牧其實也清楚自己求杭州刺史的舉動，其實是踰矩的。〈上宰相求杭州啟〉云：

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而為之，某今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唯超顗，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⁴⁴

杜牧清楚知道「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擔任杭州刺史，以他當時的官階與資歷「是官位未至也」。所以在正常情形下，是不可能由員外郎之職擔任屬於上州的杭州刺史，但為了實踐對杜顗的承諾，杜牧也只能不斷低聲下氣的嘗試。乞求杜顗所在地的杭州刺史不允，便改求杭州旁邊的湖州刺史；上書一次、二次不行，就再寫第三次、第四次。屢次以卑微言辭上書乞求外放，若不是因為手足親情，⁴⁵若不

⁴¹ 同前註，頁 812。

⁴² 同前註，頁 1010。

⁴³ 同前註。

⁴⁴ 同前註，頁 1019。

⁴⁵ 杜牧甚至有〈為堂兄槩求澧州啟〉，更可見其對於親人的重視。

是因為必須一肩扛起親人的醫藥費及生活費，而擔任刺史的俸錢又比京官高上許多，⁴⁶那個曾經心高氣傲、有著宏大治世理想的杜牧，又何必放棄他所說的「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⁴⁷如此榮耀之職。

杜牧終於在大中四年（850）求得了湖州刺史之位，並於秋天前往任職，有〈新轉南曹未敘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自見志〉一詩表述心意：

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喜拋新錦帳，榮借舊朱衣。

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酒怕旁圍。

清尚寧無素，光陰亦未晞。一杯寬幕席，五字弄珠璣。

越浦黃柑嫩，吳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魚歸。⁴⁸

詩中前四句使用「捧詔」、「羽翼飛」、「喜拋」、「榮借」之詞，表達即將出任湖州刺史的興奮之情，但接著四句卻彷彿另有隱情，「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恐怕是告誡自己避免因有才而遭禍，不要顯露機心；「宋株聊自守」用「守株待兔」之典；⁴⁹「魯酒怕旁圍」則用「魯酒薄而邯鄲圍」之典。⁵⁰前一句先是嘲諷自己拘泥守成，不知變通，下

⁴⁶ 杜牧所求之杭州、湖州均屬上州，除了俸錢較下州高之外，尚有其他正當之收入。根據賴瑞和的討論與整理，這些額外的收入，除了有「來自兩稅中『留州』部分的稅錢，在個別地區，部分可能來自青苗錢和鹽利等。但由於各州的戶數和稅賦收入不同，這就造成了中書門下在會昌六年奏疏中所說的現象：各州刺史俸祿『俸祿不同，等給無制』」。參見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頁 362-363。事實上，根據杜牧外甥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所言：「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杜牧任湖州刺史僅一年左右，卻能夠以刺史俸錢「創治其墅」，可見上州刺史俸錢之豐厚。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3。

⁴⁷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1018-1019。

⁴⁸ 同前註，頁 407。

⁴⁹ 東周·韓非云：「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見氏著，《韓非子》，頁 95。

⁵⁰ 《莊子·胠篋》：「胥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天工書局，1989），頁 346；《淮南子·繆稱訓》：「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

一句又似乎在暗示自己擔心會無端遭受牽累，顯示杜牧似乎在憂慮或閃躲什麼，而從首兩句連貫而下的語意來看，這些憂慮似乎來自於政治上的紛擾。接著，詩卻一轉，寫出期待過著無拘無束、開懷痛飲、舞文弄墨的生活，最後藉著「黃柑嫩」、「紫蟹肥」襯托出自己原有的「江海志」終於找到適合的地點了。

由於杜牧前兩年才好不容易透過援引回京任職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現在卻又說自己「平生江海志」，差異頗大，故周錫韞認為杜牧之所以請求外放，除了經濟的原因外，「一定還有政治上、人事上的原因」。⁵¹若參照上述所討論「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酒怕旁圍」四句的言外之意，則周錫韞的說法似有道理，然稍嫌簡略，難以確定。相較之下，繆鉞的論述，便清楚的說明了杜牧此時請求外放的兩層原因：表面原因是經濟因素，深層原因則是不滿朝政：

杜牧屢次上書給宰相，請求外放，表面上是提出經濟的原因，但是骨子裡還可能另有隱衷，就是不滿意當時的朝政，覺得在朝也不能有所作為……〈長安雜題長句〉諸詩可以參悟其中消息。所以當大中四年初秋暑退，杜牧準備到湖州上任去的時候，他到樂遊原遊賞，作了一首絕句詩（此指〈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更透露了對時政的不滿……詩中說「樂遊原上望昭陵」言外之意，就是認為當時政治不好，不如貞觀之世，所以思念唐太宗。⁵²繆鉞所提及〈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其義尤值得玩味：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⁵³

萌微，故民慢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西漢・劉安著，東漢・高誘注，《淮南子》（臺北：世界書局，1958），頁162-163。

⁵¹ 周錫韞，《杜牧詩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154。

⁵² 繆鉞，《杜牧詩選（補改本）杜牧傳杜牧年譜》，頁277-278。

⁵³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320。

葉夢得認為：「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⁵⁴「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貞觀之治」也為後人所崇敬，故「樂遊原上望昭陵」一句，的確容易解釋為懷念大唐盛世。然而，就在杜牧開始乞求外放刺史的大中三年（849），唐朝內外的局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外部分，陸續收復了杜牧一直關心的河西、隴右地區，杜牧還寫下〈今皇帝陛下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睹聖功輒獻歌詠〉一詩以為祝賀；朝政部分，影響中晚唐政局的牛李黨爭，也隨著李德裕於十二月卒於崖州，正式宣告結束。對於大中二年（848）十二月才抵達長安任職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的杜牧來說，應該正逐漸感受到朝廷新的氣象，尤其杜牧很快又於大中四年轉任為吏部員外郎，吏部司掌銓選，是二十六司中最清望的郎官之一，⁵⁵可見杜牧並非不受重視。因此，若說杜牧在大中三年潤十一月及大中四年夏，連續上書乞求外放之舉，是因為「不滿意當時的朝政，覺得在朝也不能有所作為」，似不甚合理。此外，杜牧在大中四年（850）秋，才如願出守湖州，卻在隔年春天杜顥病故後，秋天就回到長安，僅留在湖州一年，如果說是因為對朝廷不滿，怎麼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即返回？再回到此詩來看，並沒有強烈的憤慨之氣，前兩句反而是一種近似自嘲的論述，故與其說是「不滿意當時的朝政」，不如說是感嘆自己在必須顧及手足親情和負擔家庭經濟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由自己親自完成治國理念，那個企盼由自己再創大唐盛世的願望，也就無法實現，所以只能悵然的望著昭陵遙想了。在湖州刺史任上，杜牧的心態也明顯轉變，雖然依舊關心朝政，⁵⁶但銳氣盡收，不再是那位充滿豪氣、風流倜儻的才子了。

⁵⁴ 宋·葉少蘊，《石林詩話》，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250。

⁵⁵ 賴瑞和：「二十六司以吏部司、吏部考功司（開元二十四年之前仍掌貢舉時）、左司和右司等司為最望。」、「（杜牧）從司勳員外郎擢升為吏部員外郎，這是最清望的郎官之一。」見氏著，《唐代中層文官》，頁163、181。

⁵⁶ 大中五年（851），在湖州刺史任上，仍有〈上鹽鐵裴侍郎書〉力勸裴休革除監院弊端。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889-892。

理解至此，再回頭思考〈新轉南曹未敘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自見志〉一詩，則「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酒怕旁圍」的深層涵義，或許就是一種自我釋懷、自我調解，努力說服自己當下的選擇是正確的吧！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放下好不容易爭取到進入政治核心的機會。

當杜牧自湖州刺史調任回京，官拜對政治前途極有助益的考功郎中及知制誥時，⁵⁷寫了〈途中一絕〉：

鏡中絲髮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

惆悵江湖釣竿手，卻遮西日向長安。⁵⁸

明明即將面臨仕途重要的轉捩點，但這首詩中完全看不出一點喜悅之情，反而有一種歷經風霜後的平淡情緒。或許是因為杜牧在痛下決心放棄政治前途後，卻仍舊沒有挽回杜顓的生命，使他的情緒再也無法激起波瀾吧！

四、結論

〈遣懷〉詩中「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千百年來琅琅上口，杜牧的名句似乎總讓他與「風流才子」畫上等號。然而，在浪漫風流的表象下，杜牧實是在家族衰落後，背負振興家業、照顧弟妹的長兄，他有卓越的眼界和才華，也有崇高的政治期許，但在「家庭責任」面前，卻必須面對一次又一次「不得不」的抉擇。手足親情的羈絆，尤其是對其弟杜顓的情感，逐漸影響了杜牧的仕宦生涯，致使杜牧至少兩度主動放棄較具政治前途的京官：

⁵⁷ 考功郎中屬吏部，從五品上，考核文武百官的功過善惡，以審察諡號是否得當等；知制誥掌詔敕策命的工作。杜牧隔年馬上再升任正五品上的中書舍人。

⁵⁸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579。

第一次是在唐文宗開成二年（837）任職監察御史時，為了陪杜顗尋求名醫，請假過百日而遭解職後，進入了宣歙觀察使崔郾幕中。

第二次則是在大中三年（849）任職吏部員外郎時，因為曾答應寓居揚州的杜顗「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同時又必須負擔「病弟孀妹」以及全家的開銷，促使杜牧連續以卑詞上書、寫詩以乞求外放上州刺史，最終於大中四年獲得湖州刺史一職。

雖然隨著杜顗的離世，杜牧已無牽掛，但那位曾經年少得志、意氣風發的杜牧，卻再也沒有回來。學者常以「牛李黨爭」來評斷杜牧政治生涯的起伏，但細考杜牧生涯的種種際遇起落，可知外在政治環境雖波雲詭譎，但內在手足親情的羈絆更是深切影響杜牧仕途選擇的重要因素。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周】鶡冠子、【宋】陸佃解，《鶡冠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陰繆氏菰風堂藏明覆宋刊本，1965。
- 【東周】韓非，《韓非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黃蕘圃校宋鈔本，1965。
- 【西漢】劉安著、【東漢】高誘注，《淮南子》。臺北：世界書局，1958。
-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72。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 【宋】葉少蘊，《石林詩話》，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天工書局，1989。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勾利軍，《唐代東都分司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周錫馥，《杜牧詩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胡可先，《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20。

——，《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8。

——，《唐代高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18。

繆鉞，《杜牧詩選（補改本）·杜牧傳·杜牧年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顏崑陽，《杜牧》。臺北：國家出版社，1990。

（二）期刊論文

朱錦雄，〈從「大和二年制舉事件」和「甘露之變」二事解讀杜牧對宦官的看法〉，《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第十六卷第2期（2022.7），頁194-208。

——，〈牛李黨爭與杜牧的政治立場〉，《東華漢學》第39期（2024.6），頁121-142。

李昱東，〈唐代科舉制度的演進〉，《空大人文學報》第19期（2010.12），頁179-208。

Selected Bibliography

- Wu, Zai-Qing. *A Chronologically Annotated and Collated Edi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u M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Hu, Ke-Xia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Yongzhen Reform*.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0.
- Fu, Xuan-Chong.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Wen Shi Zhe Publishing House, 1994.
- Lai, Rui-He. *Lower-Level Bureaucrats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0.
- Lai, Rui-he. *Mid-Level Bureaucrats in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18.
- Lai, Rui-he. *High-Level Bureaucrats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 Miao, Yue. *Selected Poems of Du Mu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Edition) with Biography and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Du M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21.
- Yan, Kun-yang. *Du Mu*. Taipei: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0.
- Chu, Chin-Hsiung. "Interpreting Du Mu's Views on the Eunuch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Incident of the Second Year of Dahu' and the 'Sweet Dew Coup'". *Providenc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6, no. 2, 2022, pp.194-208.
- Chu, Chin-Hsiung. "The Niu-Li Factional Struggle and Du Mu's Political Stance".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9, 2024, pp.121-142.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ffection” on Du Mu’s political career

Chin-Hsiung Chu^{*}

Abstract

Du Mu’s reputation for his romantic demeanor has long been celebrated, earning him the image of a “gifted and amorous man of letters.” Indeed, his tenure in Yangzhou, serving with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marked the most flourishing and high-spirited phase of his life. However, once he departed from Yangzhou, his official career underwent repeated fluctuations, in which the bonds of fraternal affection played a constraining role—significantly shaping his career choices and their eventual outcomes.

Scholars have often interpreted the vicissitudes of Du Mu’s political career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Niu-Li factional conflict.” Yet, a close reading of his poetic and prose writings reveals that kinship and fraternal sentiment in fact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his life. Hi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is younger brother, Du Yi, in particular, repeatedly influenced his decisions at crucial junctures in his official career.

Although the sequence of Du Mu’s appointments and transfers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existing biographical studies, few discussions have explored how fraternal affection may have affected his 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 during these changes. This study therefore takes this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inner transitions and emotional dynamics that underlay Du Mu’s decisions amid the turning points of his official life.

Keywords: Du Mu, fraternal affection, Du Yi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